

山东财政学院学术文丛 2009

反倾销、贸易保护与 公共利益

朱庆华 著

SHANDONG CAIZHENG XUEYUAN
XUESHU WENCONG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山东财政学院学术文丛

反倾销、贸易保护与公共利益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反倾销、贸易保护与公共利益/朱庆华著.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8

(山东财政学院学术文丛)

ISBN 978 - 7 - 5095 - 1604 - 1

I . 反… II . 朱… III . ①反倾销法 - 研究②保护贸易 - 研究
IV . D912.290.4 F74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5105 号

责任编辑：卢关平

责任校对：徐艳丽

封面设计：邹海东

版式设计：汤广才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

URL: <http://www.cfehp.cn>

E - mail: cfehp @ cfehp.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100142

发行处电话：88190406 财经书店电话：64033436

北京财经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80 × 1230 毫米 32 开 13 印张 298 000 字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26.00 元

ISBN 978 - 7 - 5095 - 1604 - 1/F·1393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本社质量投诉电话：010 - 88190744

山东财政学院学术文丛

编 委 会

主任委员：袁一堂 黄 琦

副主任委员：聂培尧 王玉华 慕好东
委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玉华	王培志	王传荣
孙秀清	刘正林	刘瑞波
曲吉林	李来胜	闫庆悦
吕玉芹	吴国华	毕秋丽
杨德新	岳 军	袁一堂
聂培尧	曹洪军	黄 琦
黄 磊	韩庆华	慕好东

总序

Zong Xu

《山东财政学院学术文丛》（以下简称《学术文丛》）是山东财政学院为集中展示本校学人学术研究成果而编辑出版的系列丛书。《学术文丛》的出版，对于落实山东财政学院“学科立校”与“人才强校”的发展战略、繁荣学术研究事业、加强同学术界的交流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始建于 1986 年、由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校名的山东财政学院，是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由财政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创办、实行以地方管理为主的普通高等财经院校。学校目前拥有 14 个二级学院，43 个本科专业，22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和 MBA、MPA 两个专业学位授权点。学校学科门类齐全，已形成以经济学、管理学为主，文、法、理、工等六大学科门类相结合的学科结构。其中财政学、会计学、金融学、企业管理、国际贸易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为山东省重点学科，财政学与企业管理为省级重点强化建设学科。在山东省政府确定的“泰山学者”特聘教授设岗学科中，财政学、金融学位列其中。依托于以上优势学科与特色学科，一批批学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脱颖而出，学校也由此成为省内著名、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人才高地。

在人才培养方面，山东财政学院广纳全国英才，以“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业务工作能力强、综合素质高、具有国际视野的

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了两万多名优秀毕业生。其中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毕业生或被中央机关、国家部委和著名公司录用，或考取名牌高校研究生继续深造。目前山东财政学院的毕业生已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为学校赢得了较高的社会声誉。“学在山（东）财（政学院）”已成为莘莘学子努力追求的人生目标。

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间，山东财政学院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这既是“求是崇真、博学笃行”的校训与“高标准、严要求、好校风、有特色”办学指导思想得以落实的必然体现，也是学校实施“学科立校、人才强校、开放兴校、依法治校”战略、积极推进以提高教学水平与科研水平为核心的综合改革的必然结果。近年来，为把学校建设成为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多科性高水平特色大学，学校在启动本科教学质量工程的同时，启动了研究生学位点建设工程，加快推动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工作上层次、上水平。围绕这一目标，学校不断优化学术环境，提倡学术民主，创新学术激励机制，科研工作取得重要突破，并涌现出了一批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为向外界推介这些学术研究成果，进一步繁荣学术研究事业，校领导审时度势，决定出版《山东财政学院学术文丛》。《学术文丛》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编辑出版的。

为使《学术文丛》反映、代表我校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学术文丛》在书稿的遴选过程中，严格学术标准，规范评审程序，采用了校外专家审稿与校学术委员会评审确定的机制，最终确定入选《学术文丛》的书稿。经此严格的筛选，这一部部书稿以其较高的研究水准与学术价值得以入选。应当指出的是，这些书稿不仅集中反映了我校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而且展现了我校学人的时代风采。在入选者中，既有名气较大的知名学者，也有砥柱中流的学术中坚，还有崭露头角的学界新秀。在他们中间，或术业有专攻，或名气有大小，或起点有高低，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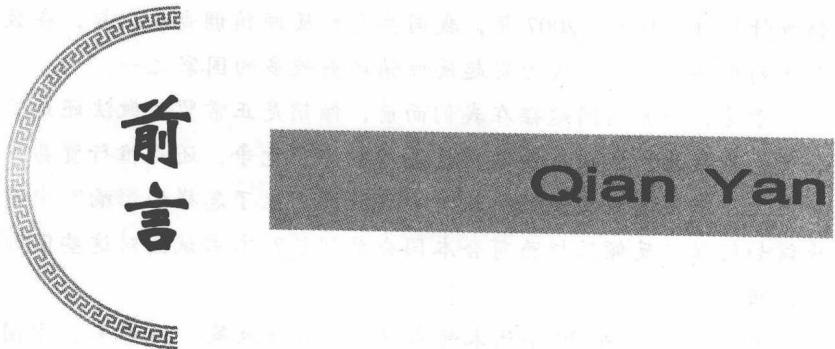
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内，瞄准学术前沿，不畏路途艰辛，治学严谨，用力勤苦，最终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可以说，这一部部书稿凝聚了作者多年来潜心学术研究的心血汗水，展现了财院学人勇攀学术高峰的时代风貌。

我们相信，《学术文丛》的出版不仅在加快学术队伍建设、推动学科建设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在加强同学术界的交流、扩大学校的学术影响力等方面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为此，今后我们还将每年遴选 10 部左右的书稿出版，推动我校学术研究事业繁荣兴盛，薪传不息。

《学术文丛》的顺利出版，得到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张立宪副总编、林治滨先生为丛书的出版付出了诸多辛劳，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在《学术文丛》的出版过程中，山东财政学院校领导高度重视，校科研处精心组织，各位作者积极配合，谨此我们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山东财政学院学术文丛》编委会

2009 年 3 月 12 日



1904 年，加拿大制定了世界上首部反倾销法。然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反倾销措施应用不多，影响有限。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反倾销措施应用日趋广泛。1995 ~ 2008 年，39 个 WTO 成员针对 90 个国家或地区的出口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 3305 起，有 2106 起案件实施最终反倾销措施。反倾销成为应用最为广泛的贸易救济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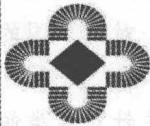
反倾销措施的滥用损害了正常的世界贸易秩序，中国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据统计，1981 ~ 2001 年，中国产品共遭受反倾销调查 422 起，占各国反倾销调查案件的 9.4%，位列世界第一。另据 WTO 统计，1995 年至 2008 年上半年，WTO 成员共针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 640 起，占 WTO 成员反倾销调查总数的 19.4%；同期 WTO 成员针对中国产品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案件达 441 起，占 WTO 成员实施反倾销措施案件总数的 20.9%。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和反倾销措施的数量均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和地区。

1997 年 3 月我国首部反倾销法规的颁布和实施，改变了我国长期单方面作为反倾销目标国家的处境，我国开始对进口产品开展反倾销调查。截至 2008 年 6 月，我国共发起反倾销调查 50 起，涉及 24 个国家和地区的 46 种产品。在已经审结的 48 起反倾销案件中，有 40 起案件最终裁定对进口产品征收反倾销税。按 WTO 反倾

销统计标准，1997~2007年，我国共发起反倾销调查150起，在数量上列世界第7位，成为发起反倾销调查较多的国家之一。

于是，一系列问题摆在我面前：倾销是正常贸易做法还是不公平竞争行为？实施反倾销措施是维护公平竞争，还是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实施反倾销措施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中国应该如何保证反倾销措施符合本国公共利益？本书试图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

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实行改革开放政策。30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超过100倍，目前贸易规模列世界第3位。对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成为全球最富活力和最有增长潜力的国家之一。毫无疑问，中国从对外开放和全球贸易自由化中获益颇多。然而国际经济竞争将一直存在，贸易保护也将持续存在。维护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同时从国家整体经济利益出发权衡贸易保护的得失，应该是我国制定和实施对外贸易政策的一个基准。从这一点出发，作者剖析了反倾销措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性质，构建了我国落实反倾销公共利益原则的规则框架，期望对我国的反倾销政策的完善有所裨益。



中文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产品频繁遭遇国外反倾销调查，妨碍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健康发展。1997年以来，中国也开始对进口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目前已经成为反倾销措施的重要使用国家。作为世界贸易中首要反倾销目标国家的特殊处境，以及伴随复关和入世进程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使中国反倾销法规的制定和实施表现出一些贸易保护和贸易报复倾向。在上述背景下，中国需要反思反倾销措施的真正意义所在，并据此重新定位本国的反倾销政策。

作者以美国和欧盟（欧共体）反倾销法规与实践为重点，对反倾销制度、规则、实施过程与效果进行分析，说明反倾销已经背离维护公平竞争的初衷，实际成为进口国向国内进口竞争产业提供不合理保护的手段，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滥用反倾销措施，不仅损害本国下游厂商和消费者的利益，而且损害出口国的正当贸易利益，恶化世界贸易环境，侵害世界贸易自由化的成果，必须予以反对与遏制。在此基础上作者分析了中国反倾销措施的实施情况，强调关注反倾销措施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就落实反倾销公共利益原则构建规则框架。

本书共分为十一章。

第一章为导论，介绍本项研究的选题背景与意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简要回顾，总结本文的主要观点

与创新之处。

第二章通过分析六种主要倾销类型的发生背景与过程，认为除掠夺性倾销会破坏进口国市场竞争环境并损害进口国长远利益外，其他类型的倾销均属于正常的贸易与竞争行为，对进口国的影响与一般进口并无区别。而掠夺性倾销因受条件限制，发生的几率极低。一般性地认定倾销属于不公平贸易行为，并针对各类倾销进口实施反倾销措施，是出于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需要。

第三章依据大量实证资料对反倾销税的经济效应进行分析。反倾销税通过限制倾销产品进口，保护国内进口竞争产业，但损害下游生产商和消费者的利益。对进口国反倾销措施总体福利效应的一般均衡分析表明，反倾销会给本国造成净福利损失。同时，反倾销措施损害出口国的贸易利益，对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和国民经济的负面影响尤其突出。从国内贸易政策和世界贸易政策的角度评价，反倾销税措施均具有明显的损人利己的贸易保护主义特征。

第四章剖析了反倾销税的征收条件及其实施过程中存在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倾销认定中正常价值的确定和出口价格与正常价值的比较均涉及多种方法和限制条件，选择不同方法时具有的灵活性使各国反倾销当局得以尽可能增加对倾销的肯定性认定和提高所认定的倾销幅度。在产业损害的认定方面，对国内产业范围的模糊界定和随意扩大，为保护国内产业奠定了基础。产业损害的三种形式均缺乏明确的判定标准，损害认定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国当局的主观判断。对不同来源的进口进行产业损害的累积评估，显著增加了认定产业损害存在的几率。将倾销与产业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要求从“主要原因”降至目前的“最低原因”，为进口国限制贸易和保护国内产业大开方便之门。

第五章通过对反倾销税征收涉及的复杂程序中一些主要环节的分析，揭示了多边和国别反倾销规则设计及其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偏袒进口国国内产业利益的倾向。从反倾销调查申请看，只要支

持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厂商的产量占国内产量的 25% 以上，即被认为代表国内产业，这种代表性令人质疑。在反倾销调查中，涉案出口企业常常因各种原因被认定不予合作，而被适用不利的“现有最佳资料”。多边反倾销规则提倡实施低税规则，但实际应用十分少见。WTO 反倾销协议关于期满复审的规定是对无限期滥用反倾销措施的某种限制，但规则漏洞为一些国家随意延长反倾销税实施期限创造了条件。对一些国家以反吸收和反规避为由，提高原定反倾销税率和扩展反倾销税征收范围的做法，多边反倾销规则没有任何制约，默许这些国家通过有关措施强化对国内产业的保护。

第六章专门探讨了对中国具有特殊意义的非市场经济规则问题。非市场经济规则问题源于经济体制差异，但最后却演变为一些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借口。无论欧盟采用的类比国价格方法还是美国采用的替代国生产要素价格方法，都是借助另外一个国家价格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忽视或抹杀了不同国家之间贸易上的比较优势，是对非市场经济出口国的歧视。欧美国家在反倾销中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并通过有关协议坚持在中国加入 WTO 后 15 年内仍可针对中国出口产品实施非市场经济反倾销规则，目的在于通过歧视性的反倾销规则强化对国内产业的保护。

第七章探讨了反倾销制度的改革思路。反倾销措施被广泛用于贸易保护主义目的，对多边贸易体制构成威胁。理论界和各国政府提出了许多改革反倾销制度的建议，大致分为三种思路。第一种思路是用保障措施协议取代反倾销规则，其合理性来源于绝大多数反倾销措施实际上被用作贸易保障措施，但这种改革本身不能解决倾销涉及的竞争问题。第二种思路是用竞争法取代反倾销法。倾销属于竞争问题，用竞争法解决反倾销问题应是最终解决方案。但基于各国竞争法发展状况，这种目标短期内无法实现。第三种思路是改进反倾销协议条款，强化反倾销纪律。这是一种传统的渐进改革方

式，易于推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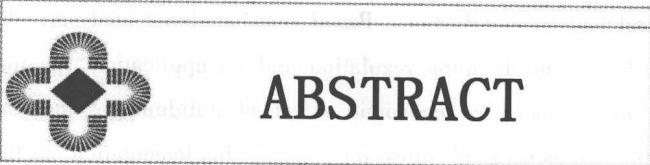
第八章分析反倾销与公共利益的关系，探讨在反倾销中引入公共利益评价的意义。反倾销措施作为对外贸易政策手段，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进口国家或地区的公共利益，而不应局限于国内产业利益。在实施反倾销措施前，有必要对该措施对公共利益的影响做出评价。根据公共利益评价结果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实施反倾销措施，使反倾销不再仅仅停留在保护国内受损害的产业，而是服务于国家的总体经济利益。

第九章考察分析欧盟反倾销法共同体利益原则及其执行情况。欧盟在每一起反倾销裁定中，均对拟实施的反倾销措施是否违反共同体利益做出分析认定，对实施反倾销措施不符合共同体利益的案件则予以终止；对实施反倾销措施符合共同体利益的案件，欧盟当局根据低税规则确定反倾销税率。虽然从表面看共同体利益评价对欧盟反倾销措施的影响不大，但共同体利益评价机制的建立对于发挥反倾销措施的应有作用具有积极意义。

第十章考察加拿大反倾销法公共利益条款及其实施情况。加拿大反倾销公共利益调查的特点在于其具有独立的发起程序，并将公共利益评价结果与反倾销税率的确定联系起来。如果国际贸易法庭在公共利益调查中认定，按终裁确定的倾销幅度全额征收反倾销税不符合公共利益，将向财政部长提出降低或取消反倾销税的具体建议。公共利益调查为利害关系方和反倾销当局关注各方自身经济利益以外的公共利益问题提供了制度保障。

第十一章分析了我国反倾销法实施情况及其经济效应，构建了我国在反倾销中落实公共利益原则的规则框架。对中国反倾销措施经济效应的初步分析表明，反倾销措施对进口竞争产业发挥了一定保护作用，同时有证据支持反倾销措施对下游产业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由于中国现行反倾销措施很少涉及直接消费品，反倾销措施对消费者利益的影响尚不明显。2004年4月国务院对反倾销条例的

修订，增加了反倾销措施必须符合公共利益的规定，是中国反倾销规则的一大进步，但未得到有效落实。作者建议我国制定反倾销公共利益评价规则，对拟实施的反倾销措施普遍开展公共利益评价，综合考虑国内产业、下游用户和消费者等多方面的利益，对公共利益评价做出详细披露，并根据公共利益需要调整反倾销税率。



Since China launched its reform and opening -up program, its exports have been frequently investigated by foreign antidumping authorities, which hampered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China started to take antidumping actions against imports in 1997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user of antidumping measures. As China is the foremost target of world antidumping actions and the country is experiencing rapid trade liberalization as a result of its bid for resumption of GATT contracting party status and the subsequent WTO membership, its antidumping regulation and practice exhibits certain bias for trade protection and retaliation. China's antidumping policy is at a crossroad and it is time for policy makers to rethink about the rationale for and economic effects of antidumping measures and reorient the antidumping policy.

With a focus on antidumping laws and pract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European Community), in this book the author analyses antidumping rul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as well as their evolution and effects, and concludes that antidumping has gone far away from maintaining fair trade and actually become a protectionist tool for domestic import -competing industries. The misuse of antidumping measures not only harms the downstream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of dumped products in the

importing countries; it also causes unwarranted losses to the exporting countries, distorts international trade order and erodes the fruits of multilateral trade liberalization.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the author reviews China's antidumping regul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negative economic effect of antidumping measures, and constructs a framework of rules for China's implementation of the public interest principle.

This book is composed of eight chapters. Chapter One is an introduction, covering background and justification for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review, outline of the structure and major points, as well as contributions and issues for further study.

Chapter Two discusses the rationale of six major categories of dumping and shows that only predatory dumping distorts competition and damages the long term interests of the importing country, and other forms of dumping are normal trade and competition behavior, which affect the importing economy in the same way as ordinary imports. Because of high prerequisites for successful operation, however, predatory dumping seldom occurs. To categorize all kinds of dumping as unfair trade practice and take antidumping measures accordingly is for protectionist purposes.

Chapter Three provides an economic effect analysis of antidumping duties based on numerous positive research materials. Antidumping duties, by restricting dumped imports, protect domestic import-competing industries, but hurt downstream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The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antidumping measures shows that antidumping causes net welfare losses to the imposing country. At the same time, antidumping measures reduce trade benefits of exporting countries, and have serious adverse effect on the export trade and national economy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particular. From both domestic and world trade

policy perspectives, antidumping duties exhibit clear trade protectionist features.

Chapter Four reveals the protectionist bias in the legal conditions for imposing antidumping duti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in particular. For dumping determination, the calculation of Normal Value and comparison of Normal Value with Export Price involve many methods and related conditions. The flexibility with the choice of different methods leaves it possible for antidumping authorities to increase affirmative dumping determinations and the dumping margins. For injury determination, the vague and arbitrary definition of domestic industry provides basis for providing unwarranted protection for domestic industries. The three forms of injury all lack clear standard, the determination of which relies to a large extent on the subjective judgment of antidumping authorities. Cumulative assessment of imports from different sources substantially increases the chances of finding injuries. The lowering of causation requirement between dumping and injury from "Principal Cause" to "Minimal Cause" leaves the door wide open for the importing country to restrict imports and protect domestic industries.

Chapter Five examines some major issues in the complex procedures for imposing antidumping duties, and unveils the bias in th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multilateral and national antidumping rules toward favoring domestic industries. For applications to initiate an investigation, so long as the producers supporting the application account for not less than 25 percent of total domestic production of the like product, they will be regarded as filed on behalf of the domestic industry, whose representativeness is questionable.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exporting producers may be regarded as non-cooperative for various reasons, and unfavorable Best Information Available is used. Although the multilateral agreement advocates the lesser